

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国家理想与民族品性

——兼谈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冯 国 荣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和平发展中国的国家理想、国家目标本身,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华民族固有品性内在决定的,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和文化,这种文化浸润了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合品性。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在对外关系上呈现整体上的和平礼仪外交与非攻击性,历朝历代都以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最高理想,从来没有主动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即使有战争也是“平天下”,以天下太平为目的,而不是屠杀、占领、掠夺、奴役乃至种族灭绝。所谓“朝贡制”主要是保证天下太平四海咸宁的礼仪,经济上基本都是倒贴的。中国自身数千年“协和万邦”的实践为当今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具有特殊启示意义的宝贵经验,“中和天下观”的构想,可以为人类走向善善与共的美好明天提供新的智慧。

关键词: 和平发展; 中和天下观; 协和万邦; 国家理想; 民族品性; 适度世界; 归化和合; 善善与共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6-0019-15

中国主张全球和平发展。过去我们常说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这无疑是实际的必要的。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那就是将来中国发展强大了,是不是可以不要全球和平发展了? 因此一个可能更加根本的理由是因为和平发展中国的国家理想、国家目标本身,是民族固有品性所内在决定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核心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和文化,这种文化浸润了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合品性。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整体上的和平礼仪外交与非攻击性。中国以自身数千年“协和万邦”的实践提供了对当今人类和平发展有特殊启示意义的经验。在当下,中国应当继承、弘扬这种优秀的国家理想与民族品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历史贡献”,制定出适应当今世界的“中和天下观”,为人类走向善善与共的美好明天提供新的智慧。

一、中国文化的中和性与政治、外交的和合性

中国的中和性可从中国的文化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可以归纳为儒、道、佛(禅宗)三家。儒家文化的中和性可以从仁、中、和三个命题出发去认识。儒学的核心理念是“仁”。“仁,亲也。从人二”

作者简介: 冯国荣,男,江苏常州人,青岛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涉史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城市学、经济学相关领域。

(《说文解字·人部》),是两个与两个以上人的亲爱。《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按礼的规则办事,非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④,对人、对外要无怨、要忠恕,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的继任者孟子还说爱人不仅要爱自己和自己家人,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⑤。孔子的弟子子夏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⑥。儒家的这种爱人的“仁”可以说为和平发展确立了内在人格的基本依据。儒学的另一个核心范畴是“中”,包括中庸、中道、中正、中和等等。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⑦“中”是指适度、恰如其分、无太过无不及、合理、公平。“庸”是常,是用。中庸即是适度、合理、公平的常道。《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⑧朱熹《中庸章句·题解》有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⑨适度、合理、公平的“中”是天下万物能够相处与发展的根本的道理,也是处理天下万事的“正”的方法。无论是在自然界物种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在民族国家之间,都必须坚持这个“中”,这实际上揭示了人类为什么要和平发展的原因及如何才能和平发展的路径。这对于解决当今推崇竞争、冲突,无节制索取他人、自然的“过度”状态,对于解决八大人类困境(核威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贫困与南北差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枯竭、艾滋病等疾病流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关联着“和”,常被称为中和。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⑩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⑪,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⑫。《周易》的“保合太和”与《左传》的“和能生物”还包含有和才能化生万物的意思。《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⑬“中”是天下成为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最重要的道理,致中和,天下才有秩序,万物才能发育。“仁”表示要从“爱人”做起,从个人修身从我做起,“中”揭示了天下万物相处、发展的道路与方法。最后,“致中和”天下才能有秩序地得到发展。这些都可以看作解决当前人类困境、抵达和平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

道家思想的中和性可以从自然无为、守雌不争、至虚守静出发去认识。道家主张自然天道观,在修身治政上强调自然无为,自然是自然而然,依其本性,无为是不要人为成分,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自然无为能使天下大治。老子并提出要“守雌不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提出要“至虚守静”“清静为天下正”“我为静,而民自定”。让百姓依质朴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天下就“正”,就安定。

①《论语·颜渊篇》,杨伯峻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②《论语·颜渊篇》,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23页。

③《论语·颜渊篇》,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23页。

④《论语·颜渊篇》,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23页。

⑤《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注:《孟子译注(典藏版)》,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页。

⑥《论语·颜渊篇》,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25页。

⑦《论语·雍也》,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64页。

⑧《礼记·中庸》,杨天宇注:《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13页。

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页。

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5页。

⑪《论语·学而》,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8页。

⑫《论语·子路》,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41页。

⑬《礼记·中庸》,杨天宇注:《礼记译注》,第899页。

佛教的中和性在“空”的平和恬淡、不杀生、顿悟可以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方面彰显得十分彻底。佛教有所谓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烦恼而成佛为目的,其核心范畴是“空”。“空”之一义,是说一切法(一切事物)都因缘而生,没有实在的独立的常性不变的自体,一无所有:“诸法实无所有,是空义”。这就是说现实世界一无所有,徒有虚幻,四大皆空。这种思想导致了与世无争乃至无功利可争的观念,导致了彻底的平和恬淡的心态。佛教信奉不杀生,不仅不能杀人,连动物蝼蚁都不能杀,最虔诚的信徒都只吃素。佛教认为人人可以为佛、顿悟可以成佛,有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指出了人类向善的具体途径。这对于今天仍在发动战争的某些国家领导人,对于已经犯下罪行的恐怖主义者具有极重要的戒劝省悟意义。

在中国,儒、道、佛是互相渗透的,它们共同涵养了中国的民族品性:仁爱、中和、自然、宽容、知足、向善、安稳。在中国,历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礼记》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人以中和文化修身,也以中和方式治国平天下,主要表现为:

(一)推崇仁政、德治

要求治政者忠恕爱人,立人达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①。治政者首先要正:“政者,正也”,要“道德齐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官员首先自身要有德行有操守,廉洁勤政,以民为本。在执政中,要以德礼教民、化民而不能仅靠政令刑罚,不能不教而诛,更不能施苛政、暴政。在调解矛盾上要以和为贵,要事其中。在分配上,反对聚敛,要以“均无贫,和无寡”,达到“安无倾”^③,社会和平安定。仁政、德治不是不要法,中国历来也有许多法家,只是要以仁政、德治为主导,统率法治并保障法制沿着正确的轨道实施。没有仁政、德治的法制必将走向人性缺失、矛盾激化,最终走向社会崩溃。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暴政苛政之所以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两次世界大战、当今世界仍然令人不安的根本原因。

(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④《礼记·礼运》还提到“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⑤。道家、佛家同样富有大同理想。道家的“至德之世”,质朴的自由生活也是一种大同理想。佛家企盼佛国净土、极乐世界,亿万佛教徒并为此不遗余力,而且影响到许多景仰佛教的执政者。陶渊明的“桃花源”、许行的“群臣并耕”、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乃至张鲁的“义舍”、何心隐的“聚合堂”实验等等都有类似的追求。达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很难的,但中国人一直以此为理想,也一直有志士仁人在对内对外关系上身体力行。

(三)基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思想的和平礼仪外交

《尚书》中便有“协和万邦”的思想:“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⑥协和万邦是指尧能协

①《孟子·尽心章句上篇》,杨伯峻注:《孟子译注(典藏版)》,第359页。

②《论语·为政》,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2页。

③《论语·季氏》,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72页。

④《礼记·礼运》,杨天宇注:《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2—363页。

⑤《礼记·礼运》,杨天宇注:《礼记译注》,第376页。

⑥《尚书·尧典》,王世舜、王翠叶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6页。

调各民族部落达到和顺。孔子又提出“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到今天可引申为有不同特点的国家、民族和睦相处。中国在外交上特别讲究以礼待人，“讲信修睦”，因而被视为公认的礼仪之邦。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思想与以礼待人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外交呈现明显的和合性。

1. 主体上呈现为和平、真诚、友好、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国文明曾对推动人类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这种作用绝大多数是和平、平等的,常常是无条件甚至是无私的。自石器时代始,仰韶文化彩釉就有西传。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麻织品、漆器、铸铁技术、农业技术、畜牧业技术、服饰、音乐、建筑艺术及文化礼仪陆续传到西方。自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国文明领先于世界。中国的数学、医药、农牧业、冶金、制瓷、炼丹、天文、制图、火器、水力、脉学乃至政治体制、礼仪、习俗、宗教信仰以及盐业专卖制度、贸易方式等全面传到西方。尤其是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及冶金、炼丹、制图等技术。火药分析与炼丹术成为化学的发端,爆炸力的研究成为蒸汽机的发端,纸与印刷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指南针推动了海外开拓乃至全球化。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工业文明,但是中国文明仍然对西方乃至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孔子的儒学到朱熹的理性主义成为了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孔子因而被称为“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莱布尼茨受理学的启示发展了单子论哲学,受易经启示发明了二进制,成为计算机的先驱。魁奈受中国崇尚自然、信奉礼仪的影响,以“自然秩序论”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在东方,当今被称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国除受到上述影响外,在文化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上更是直接受到中国全面影响。在所有这一切方面,中国的奉献不仅是友好的平等的,而且常常是无条件的甚至是无私的。这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向世界(包括中国)扩张,让多国(包括中国)受尽奴役、盘剥与屈辱,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目的只是友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向世界传播先进技术,展示中华文明。而同一时间及稍后的西方的一些远航活动则是殖民征服、杀掠占领。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对比。

2. 中国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十分讲究礼数,实行礼尚往来。将仁政、德治延伸至国际关系。这即使从中国与附属国的“朝贡”关系也看得很明显。朝贡关系自然有一定的屈辱性质,但即使是中国与邻国的“朝贡”关系也主要是一种礼仪性的外交形式,是协和万邦——保证天下太平、四海咸宁的一种仪式。进贡的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稀罕物、纪念物,如象牙几对、虎皮几张之类。而中国的回赠往往超过贡物的价值,有时还有很重的经济援助与技术文化赠与,包括有时要回赠很多的路费(清朝每年给朝鲜一个国家的朝贡团的路费是八万两,而当时清朝全年总收入才三千万两)^②,免税收购使臣带来的货物,这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祥和融洽关系与进行平等交流。这种礼尚往来很符合中国人的行事方式:穷亲戚来了,一般回赠总是比来礼更多些,反之就会被讥为小气势利。韩国学者全海宗先生在其《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对自三国至清的中朝的朝贡关系作了系统研究,指出在相当一个时期“朝中关系与其说是尊者与卑者、强者与弱者的宗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和平的对等关系,即与‘朝贡’一词相比,‘交融’用语更为贴切”^③,“朝贡关系并不企图政治性的直接支配,仅具备服从的形式就足够了”^④。他并且认为对于朝贡,附属国往往比中国还要积极:“朝贡制度可谓是中国特殊的对外接触方

①《论语·子路》,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41页。

②[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③[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141页。

④[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21页。

式,其制度化是否反而凭借异民族的强烈刺激,甚或进而被异民族国家推进着”^①。中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一些征服者民族的劫掠盘剥奴役,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于附属国,中国从来不曾建立过殖民地,所实施大抵仍然是仁政、德治的原则,行忠恕王道,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义交天下,“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四) 反对战争、战争的防卫性与使天下太平的战争目的

儒家提出和为“天下之达道”,提倡以德服人,和平地解决争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③。道家则提倡“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⑤。连兵家也主张不得已才用兵:善之善者为“不战而屈人以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⑥。法家虽然不回避暴力,也说“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攻战者,可亡也”。佛家则更是不杀生,连杀动物也是不允许的。由此中国在历史上尤其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的历史上,基本没有主动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防卫性战争(详见下一节),即使有战争,也大多有明显的非奴役、非劫掠性,而以天下太平为目的,称为“平天下”。中国的这些对外战争,与历史上一些其他国家的对外战争尤其是西方近现代殖民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殖民战争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大屠杀,甚至实施种族灭绝;二是大面积占领掠夺土地及资源;三是把人分为几等,加以奴役、歧视,甚至直接将征服者当作奴隶。但是中国尤其是中原发生的战争大部分有着明显的保卫自身安全与使天下太平、四海咸宁的目的。对北方民族大部分是赶走打平使之不再骚扰为目的,打完之后即使大胜也很快撤兵中原,没有发生过种族灭绝,也没有大面积占领土地,进行盘剥掠夺。有一句唐诗,很能代表中国对外战争的目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外战争只是以“不教胡马度阴山”为目的。中原主导的和约很少有要对方贡献子女玉帛,如有要求对方提供马匹之类,最后也大多化为朝贡制,变成平等交换甚至倒贴。对南方民族则大部分有所谓开化“生番”的作用,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由于存在着泛爱众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牢固的观念,无论对什么民族,中原王朝都没有制定把人分为几等的奴役、歧视政策。

(五) 为世界提供多民族和合相处的大一统范例

自汉代始,中国多次演绎了多民族和合相处大一统范例,这与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照。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仿,但是欧洲各民族自罗马衰亡后一直不统一,相互争斗以至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欧洲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其“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⑦。而中国自汉代起便基本和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内战,尤其是改朝换代时,但比起和平统一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正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汉朝刘邦把中国

① [韩]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129页。

② 《论语·季氏》,杨伯峻注:《论语译注》,第172页。

③ 《孟子·离娄上》,杨伯峻注:《孟子译注(典藏版)》,第188页。

④ 《老子·第三十章》,冯达甫注:《老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⑤ 《老子·第三十一章》,冯达甫注:《老子译注》,第74页。

⑥ 《孙子兵法·谋攻》,陈曦注:《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页。

⑦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28页。

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①,“中国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多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②,“就中国人来说,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从亚洲国家能很好相处的角度说的:“在中华儒家文明的辐射下,(亚洲)各国在思维方式等多个文化层面上存在着共鸣。亚洲是在世界体系中唯一能看到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地方区域。世界未来的长期发展取决于亚洲的未来和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④

中国这种文化的中和性与政治外交的和合性在国际上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与肯定,这其中不仅是专家,还包括有识之士。1993年,来自世界各地大小120个宗教团体6000多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会议,发表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的原则,宣称“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的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1998年,七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纽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发展,要到两千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中国的这些思想与“原则”可以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和平发展的资源,应能成为一种有着特殊说服力的全球共识。

二、中国对外战争的防卫性与归化和合性

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可以从全部中国历史尤其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的历史得到有力的佐证,这里仅从中国的对外战争史作一个回顾。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⑥这种说法反映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观察中国的对外战争可有两种视角:一种包括了而今内蒙、新疆、东北、西藏等地的大中华的视角,一种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也可以说是汉族为主的单元、儒家文化单元)的视角。

(一)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发生的“对外”战争,基本上都是防御性、自卫性的,尽管中原也曾多次由自卫转为反击,取得辉煌的胜利

其实中原的概念也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一种是以发祥地河南为中心的数省,如商汤颠覆夏族,西周推翻殷商,均称为“入主中原”。二是大约相当于秦的版图的范围,所谓“逐鹿中原”的中原大致就是这个范围。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三是从汉代开始对外族入侵长城以南也称为“犯我中原”,此时“中原”基本上包括了北至长城,南至闽粤,东至东海、黄海、渤海,西至河西走廊、四川的一个广大区域。这一个区域自秦汉起不仅疆域统一稳定,而且文化大致相

①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5页。

②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89页。

③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4页。

④ 转引自罗峰:《未来世界的长期发展取决于亚洲》,《社会科学报》2006年第1041期,第7版。

⑤ [德] 孔汉思、K. 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⑥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0页。

同(也可称为儒家文化核心圈区)。以前也有人把这个范围称为“中国”,如《汉书·陆贾传》称:“皇帝(汉高祖)……继五帝三王之业,经天下,理中国,中国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福,政由一家,自天地创判未有始也”。这里“中国”大致是汉代的范围。为了避免这个“中国”与今之大中华混同,本文对此范围采用“中原”的提法。

历代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发生的“对外”战争很多,比如:商伐土方、鬼方之战,周宣王征讨戎狄,齐桓公伐戎狄,秦始皇北御匈奴,汉代北御匈奴,唐代北御突厥,宋与辽、西夏、金、蒙古之战,以及明与后金之战等等。在这些战争中,中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动的,处于防御地位,有些战争看似中原对外扩张,而实际情况,基本上还是起于非中原来犯中原而发生的自卫反击战,如汉北御匈奴、唐北御突厥等。这里重点讲讲汉、唐的“对外”战争。

1. 汉代北御匈奴。汉代北御匈奴完全始于防卫,且是在极其受辱的情况下。汉初北御匈奴始于伐韩王信。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徙韩王信于太原,本就是为御匈奴。是年秋匈奴入侵围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并与匈奴共攻汉,直趋河南。高祖遂于公元前200年将三十万步骑兵亲征迎击。匈奴冒顿单于亦亲率三十余万骑援韩王信,高祖因轻敌将十万骑兵至平城白登台,被冒顿率三十万骑兵团团围住。高祖被围七日,粮饷不继,乃遣使求和。汉岁奉公主为单于妻,献锦帛缯絮等物。前199年高祖以宗室女长公主为单于妻。自此历惠帝、吕后、文、景及武帝初年,多次嫁公主(宗室女)于单于,献秣、橐、金、帛、锦、絮及它物,凡六十八年。其间匈奴仍不断越长城扰骚,驰书“辞极褒嫚”。文帝在匈奴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先后于前177年、前166年、前158年三次出战,均无功而返。

武帝即位,开始组织大规模抗御。较重要的战争有:公元前123年,因匈奴仍侵盗不已,于马邑伏兵诱击匈奴未成;前129年因匈奴侵略边民而使卫青等分四起击匈,独卫青小胜;前128年,匈奴两万骑侵辽西、渔阳、雁门,使卫青等将三万骑击破之;前127年,因匈奴再侵上谷、渔阳,使卫青等数万骑包围河南地楼烦白羊种落而歼之。前126年、前125年,匈奴侵代、雁门、定襄、上郡、朔方等,前124年使卫青将十万骑,远袭右贤王庭于漠北歼之。前122年匈奴万骑侵上谷,武帝使霍去病将万骑进击破之。前120年匈奴万骑侵右北平、定襄郡,杀掠汉千余人,汉武帝部署大决战。使卫青、霍去病各将精骑兵五万,配以步兵十万分两纵队对匈奴作犁庭扫穴之举。卫青出定襄塞千余里攻至外蒙古库伦古车臣汗部展开激战,几擒单于(因大风沙未获),单于仅率数百骑遁。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攻至栲余山(今达里湖北方),与匈奴左贤王展开激战,大败之,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斩单于近臣,左贤王仅率十之一二遁走。此次决战匈奴大半被歼,逃遁漠北,休战七年。七年之后,匈奴卷土重来,于是,在前111年、前103年、前99年、前97年、前90年,又有五次战役,汉胜少败多。直至公元73年,东汉窦固、耿秉等北征,败匈奴。公元89年,窦宪、耿秉北征攻克北单于首都金微山(今新疆布托伦海北),仅北单于数骑遁走乌孙,遂亡其国。

汉代在北击匈奴的过程中波及西域诸小国。与这些西域小国发生战争主要是为了与匈奴周旋,有许多所谓战争实际是外交攻关,西域的国家都很小,大的才几万人,大多只有几千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班超“征讨”数个国家仅带三十六人,主要是与匈奴争夺与西域各国的联合。班超抵鄯善国时,北匈奴使也在鄯善,鄯善两面不敢得罪。班超所谓服鄯善便是斗败北匈奴使。常常是这样的局面,班超到,该国就附汉,北匈奴军到,该国便复附匈。从整体上说,汉之西征、北征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

2. 唐代北御突厥。唐代号称强盛,但其对外作战也始自被外族威迫,忍无可忍。唐代外战的主要对手是突厥。突厥兴起于南北朝时,隋代形成强大国势,东自辽东半岛,西至里海、波斯,分为东西

两部分,以阿尔泰山、金山为界。公元619年—626年,东突厥大举入侵大唐达八次之多,第六次侵入幽、并、朔、原、渭等州,第七次又进而侵入幽州、阴盘,成南下攻长安之势。李世民居前说和亲之事方退。武德九年(626)颉利、突利二可汗乘唐玄武门之变人心浮动,率十万余众分两路南侵,右路趋武功,左路趋高陵,主力直抵长安城下的渭水便桥。时长安城内兵力不过数万,唐太宗因玄武之变人心不稳,内忧外患,无奈之下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出玄武门至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卷甲韬戈,啗以金帛”以约和,“倾府库赂”,东突厥方虏男女而退,是为“渭水之耻”。

唐受此奇耻大辱,用魏徵“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励志图强,等待时机。贞观三年(629年),终于等到东突厥内乱分裂,唐太宗部署五路大军进击:李靖出定襄,柴绍出金河,王道宗出灵州道,薛万彻出营州,李世勣出云中。李靖夜袭突厥首都定襄大利城破之。可汗颉利仅以身遁,最后在苏尼失营被俘,解送长安。其国遂亡。

与东突厥尊为东亚霸主一样,西突厥在中亚也十分强大,北并铁勒(贝加尔湖至里海),西距波斯(今伊朗),南接罽宾(今克什米尔),东至阿尔泰山,控弦数十万,与罗马及波斯关系密切。东西突厥本是一家,东突厥虽平(实后又复燃),西突厥仍是患,且西突厥包括它控制的西域小国阻住唐代与世界通商的大道(丝绸之路)。唐于642年开始先后四次与之作战:第一次为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拘唐使犯伊州,凉州都督郭孝恪将轻兵将其击走;第二次为649年,沙钵罗可汗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达数十万之众犯庭州,陷金满城、蒲类县(今哈密市巴里坤),唐高宗发兵讨之;第三次为656年,因西突厥真珠叶护与沙钵罗可汗交恶争斗,遣使请唐发兵;第四次为657年,唐发动最终讨伐。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领唐与回纥联军,自北道寻击西突厥主力,在伊犁河以万余兵与沙钵罗可汗十万兵相对,以战术得当败之。沙钵罗奔走石国被擒,西突厥悉定。

在与东西突厥作战的过程中,唐还先后战薛延陀、回纥、吐蕃、西域小国等。其中战薛延陀、回纥与吐蕃主要仍为解决边患(其中吐蕃多次入侵,一度竟然攻陷唐都长安),征西域小国一方面是与西突厥周旋,另一方面是为打通丝绸之路。唐太宗有鉴于自春秋以来北方戎狄屡屡进犯;有鉴于突厥兵临长安城下,不得不倾国库以求和;有鉴于北方民族为游牧民族,倏忽来去,胜则大举侵入,败则迅速远遁;有鉴于主要对手西突厥在天山一带,东突厥东至辽东,必须把防线设出去。于是形成了西北以葱岭、天山为国防线,以有效抵御西突厥;东北以辽东为国防线,以抵御东突厥及东北诸胡的主动防御战略部署。于是有了对这两条防线的周边小国的征平。就唐而言,对外战争的总体由自卫反击至积极防御。

(二)大中华视角的对外战争可以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由非中原的少数民族发动的对外战争,这些少数民族一旦与中原统一,便归化于和合传统

第一类是由非中原的少数民族发动的对外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成吉思汗(名铁木真)自1179年起至1202年统一蒙古部族,自1207年起与其儿子、孙子三代三次西征,灭国数十(花剌子模、俄罗斯、匈牙利、波斯、木剌夷、叙利亚、黑衣大食王朝等),向南则灭金、灭宋,建立跨亚欧两洲的元朝本部及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但是自1271年改元朝起,即开始归化中原文化、中原政治体制与中原生活方式,统治范围基本收缩为元朝本部疆域,不复发动大的对外战争。这种归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明落差,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的战争政治方式只适合于战争,而不适合于和平治理,不适合于人类长期相处,而儒家中原的和合性提供了和平治理与人类长期相处的方式。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第二类对外战争是纯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主要有：

明代的抗倭战争。1547年起，倭寇扰东南沿海，北起江淮南至闽粤。明先后由王忬、张经、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发起抗击退之，主要的战役有：江泾之战、平海威之战等。

援朝抗倭战争。1592年，日本小西行长第一军驱七百余船登朝鲜，两月内占领朝鲜大部土地，欲“假道朝鲜西征中国”，朝鲜请求明出兵援助，中朝联军经历时七年的战争，击退日军。主要战役有平壤之战、碧野之战、稷山之战、蔚山会战、泗川会战、顺天会战，最后由雾梁海战歼灭日海军舰队而告终。

驱廓尔喀战争。廓尔喀即尼泊尔，1790年乘班禅喇嘛族争财产（班禅至中土，携回大量清政府所赠及善男善女所奉之物）之机入侵西藏、破日喀则，大掠扎什伦布，达赖、班禅飞告清廷，清廷派福康安、海兰察退之。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战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主要的战争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此皆众所熟知，此处细节从略。

第三类是与周边附属国的战争，但这些战争明显有别于西方一些民族的劫掠奴役战争与殖民战争，而且也受到中原中和文化的制约。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周边附属国的一些战争，往往是由于一些藩属或者附属国对于中原王朝的宗藩体制或者权力系统构成严重挑战，典型的如唐朝攻打高句丽的战争。唐朝攻打高句丽是出于建立北御突厥的大国防线的需要，但也由于高句丽对于唐帝国的朝贡体系和地缘权力结构构成威胁，还有就是所谓为前代雪耻。其实，对于这场战争也受到了一些儒臣的反对。

对于征高句丽，房玄龄曾上表谏阻：“《易》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盖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为陛下惜者此也。《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能为后世患，夷之可也。今无是三者，而坐蔽中国，为旧王雪耻，新罗报仇，非所存小、所损大乎？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①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征高句丽是有一定原因的，如“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高句丽数次攻打新罗，新罗数次请唐救之）。为了了结过去恩怨，摆平周边小国争端。但是高句丽现在并未“为中国患”，为何大事兴兵讨之？房玄龄认为是因小失大。但从房玄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战争是非劫掠性的，更非军国主义的，是“存者小，损者大”的（从前面分析的朝贡制可以看出），主要出于大的国防战略及国威等考虑，以天下平安为目的。同时也可看出中原儒家文化对唐的对外战争观仍有一定影响与制约，那就是要不为中国患不战，战之则要“知足”“知止”。这实际后来也影响到了唐代的对外战争，许多场合是遵循了“知足”“知止”原则的。韩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对高句丽的战争状态只是极短的时间，“和平关系时期绝对长于敌对关系时期”^②。同样的情形，还体现在对越南及对一些西域小国的战争。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大概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从中原单元（儒家文化单元）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外战争基本上是防御性、自卫性的，至少起因是防御、自卫。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惮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以今天大中华的角度看，少数民族主动发动过一些对外战争，但随着与中原同化而最终融入和合传统。对边际附属国的战争大都带有明显的非劫掠非奴

①《新唐书》（简体字本）卷九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05页。

②[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131页。

役性,以天下太平为目的,有别于历史上有些民族的劫掠性奴役性战争,也有别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动辄大规模屠杀甚至种族灭绝的殖民战争,更有别于军国主义。

三、建构“中和天下观”,树立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从对中国文化、政治、外交的中和性及中国对外战争史的回顾,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中华民族总体上的中和性以及中国以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为国家理想从主流上是可以肯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些中和资源,对于当今人类和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潜力。汤因比对此作出了非常高的肯定评价。他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①池田大作先生在与汤因比对话时回应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②。池田大作又补充说,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是中心,“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③。以和平发展作为理想且养成了此种品性的中华民族,应当可以对当今人类和平相处乃至解决当今人类困境发挥某种“先锋模范”作用。

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对中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中国在坚持中国立场、寻求快速发展的同时,树立人类立场,建构兼具中国立场与人类立场的人类和平发展总体思路,把传统的国家理想与优秀品性继续推向前进。其中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当下“中和天下观”,在“中和天下观”指导下建构善善与共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其基本要点我们初步思考了以下五个:

(一)对自然、社会、人三者及其关系的理解。突出对人性的基本把握,建构基于性善论的善待天下、善化天下思想,努力在全球建立普遍善意,将未来世界建构成一个善善与共的美好世界。

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命题的逻辑起点都是人性命题。能否建立一个“中和一大同”的世界,决定于人性能否达到“中和一大同”的水平。对人性的认识与提升策略是建立中和天下观、和谐世界观的基石。历史上对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有过无数次讨论,我们的意见如下:

1. 人性的基本面是善的,或者说是可以控制在善允许的范围内。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因此,有一些动物的“自我生存发展优先”的本能因素,可以说生而有私;同时人作为“动物”也生而具有许多动物都有的帮助同类的本能(如大多数动物在临危状态下都会帮助同类),可以说人生而也便有善。人因为群居构成社会成为“类”才成为人,所以人一上来就有社会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成为社会人,才脱离动物界成为作为“类”的人,除非你回到丛林去重新降为脱离了“人类”的孤独的动物。人为了融入维持人类社会,必须遵循共识性的伦理、道德规范乃至法律、制度,必须养成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人格、教养与情怀。善待他人、奉献社会因而也成为人的基本特性。因此,人从生物性的角度上有私也有善,从社会性的角度上,善成为基本特性。私在后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便不会发展成为恶,也不会影响基本的善,而内修出众的人则可以达到相对无私、至善。可以说人性的基本面是善的。偷盗、欺诈、残杀、破坏等恶行在人类社会基本上一直处于被谴责的状态,而大多数人在教育后代时,也希望后代向善。我们平时指责某些反面行为为“非人性”“灭绝人性”,说明一般人心

①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5页。

②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5页。

③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第296页。

目中的“人性”也都是正面的善的。对于人性善恶虽然中西方的说法有所不同,如基督教有所谓原罪,康德有所谓“根本恶”,在中国也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但无论中西在有一点上实际是一致的,那就是共认人可以以善来控制私,来抑制恶。基督教说原罪,但其全部教义就是要以善来还这个原罪。康德不仅提出过在人中有三种向善的原始禀赋,而且提出过“绝对的善意”的命题。荀子也说过性恶,但实际是说的自然之性,并说先王因此提出一系列制度、伦理对性恶“度而分之”,进行制约。这相当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

2. 出于善意又有恰当的善策,可以善化天下。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善善与共”的命题,我曾把我的哲学命名为“上哲学”,其中有一章叫“看哲学”。“看哲学”包括“看眼”“被看”“看好”三个部分。“看眼”是看的主体,主体要有与人为善的“善眼”,要多看“被看”对象的善面,感应、成长这些善面。善善与共,世界就会变成善世界,就会被“看好”。如果把对方看恶,以恶意看待对方恶面,那就只能交恶,因而复始地使世界变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绝大多数乃至经济、文化界包括军事界的绝大多数乃至全球公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善面的,找到这个善善与共的关键“解”,是当代思想家、政治家乃至所有地球公民的首要使命。有了这个“善善与共”的共识,就可以据此制订出各国、各利益集团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世界秩序的善策,使可善化世界、善化天下。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天下要从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应当成为人类的普遍信仰。没有这个基石,人类和平发展,建设中和天下、和谐世界,是不可能做到的。人类舍此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二)对处理国际矛盾、人类难题的理解。突出中道,建构适度、宽容、均衡、合作、共赢的世界。

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之一的中和思想,在当下可以生发设计为一个公正、合理、平衡、宽容、适度地处理协调当下世界矛盾、人类难题的总体指导思想。“中”是中庸、中正,是无不及、无太过,是公正、合理、是适度、是平衡、宽容;宽容的背后包含各种必要的折衷、妥协、退让;最后是合作共赢。“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信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公正、合理、适度、平衡、宽容、合作共赢,天下便有秩序,万物便能发育。

1. 公正、合理。要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建设全球伦理、全球秩序,乃至上升为全球制度、全球体系。中正应当成为重新安排全球权力格局、利益格局的总原则。理想的状态应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在全球权力及利益分配上机会均等。这对于既得利益的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作为霸权国家你占有那么多资源,你从一国利益出发制定游戏规则,为所欲为,本身就是不公正、不合理、不“中正”的。不消解这种特殊权力、特殊利益,世界将没有宁日。这个障碍是非逾越不可的。作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谋求快速发展,但不会加入到争夺大国特殊权力、特殊利益的行列,也没有提出争夺世界大国特殊权力、利益的必要,我们不威胁任何人,我们只谋求公正,在保证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谋取一份公正的份额。中国谋求中正、公平足矣。我们而且希望所有国家达到中正、公平的水平。超中正、公平的应当以良知的名义降下来,而不是我们向超中正、公平的水平升上去。应当让世界放心,我们中国从来也不是超中正、公平的,我们将来也不谋求超中正、公平。

2. 适度。现在的世界有许多是过度的,可以说是充斥着过度的世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威胁、权力过度、暴力过度都是偏离中正;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悬殊过大,非但不合人性,而且按历史经验是迟早要出问题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也过度。还有一个竞争过度。市场经济的竞争、个人价值实现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同样要适度,过度竞争会摧残人性、恶化人际关系、破坏经济秩序,也会贬低个人人生价值,导致无法竞争。就个人动力而言,一方面可以来自个人价值实现,同时也应来自一定的大同情怀,以为他人贡献、为社会贡献为荣。人类面临的难题几乎都是过度所导致,

所以贯彻中正之道,应当首先落实到减少过度现象,建设一个适度的世界。在一个适度的世界,非和平、不和谐的因素都可以逐步消除。

3. 平衡、宽容。平衡包括从个人心理的平衡、利益集团的平衡到国家之间的平衡。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之间的平衡,是世界维持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样,没有宽容,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也很难达到平衡,不会有真正的合作。宽容中还包括大度,包括必要的折衷、妥协、退让。

4. 合作、共赢。有了中道才有合作,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各得其所,实际是各得其中,所得平衡。“中”——分配均等才能达到真正的共赢。一方太多,一方太少就不是共赢,也不会合作。

5. 在经济上,“中”还指向发展壮大中产阶级,不使贫富差距过大;指向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能过大。只有“国际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国际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当下面临的人类各种难题,从根本上杜绝战争。

(三)对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理解。树立“零战”目标,开创协和万邦(全球共和)的安宁生动的全球格局。

1. 零战。中国的协和万邦的历史经验与作为天下太平的普遍善意首先体现在“零战”目标。和平发展分别包括和平与发展两大内容,同时又要用和平定语发展,其中首要前提是和平。当今世界具有核战争危险,核战争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所以我们没有可能承受任何一次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核战争。首先要绝对杜绝大规模战争,要对大规模战争划定一个定量界线,所有国家,不管什么理由不能逾越这个界线;对于小规模战争一经发现,必须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监控下维护正义,尽快结束。任何一方没有单方面决定战争继续的权利。

2. 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前提内容是建立大和情怀,每一国都要与他国建立零战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处理好一国诉求与全球和平的关系。每一国都要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树立为他国、为全球着想的大和情怀。协和的“协”是协作,是协调。除具体做好防患于战争未然的协调外,各国都要有对外的协和法规,联合国应当有协和万邦的条例与制度。要对全球秩序、全球体系作出共和的系统描述,制订出相应的条例,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实施。

3. 全球共和。从理论与制度上要建构全球共和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制订《全球共和宪章》,也可考虑把《全球共和宪章》的内容放进经过修改的《联合国宪章》新版之中。要切实实行全面裁军(尤其是军事强国的裁军),销毁核武器,取缔任何可能引起对抗的军事联盟。

(四)与人类立场、世界立场相协调的中国立场。

1. 作为一个历史上以和平发展著称的国家,作为一个至今对世界最具善意的国家,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历史形象维护下去,把我们的资源贡献出去。为人类寻求一个相对完善的可以普遍接受的发展路径。

2. 强调要与人类立场、世界立场相协调,在此前提下建构中国立场。这种中国立场主要包括:①中国以中和天下观寻求人类总体和平发展;②中国不谋求大国特殊权利,不制定类似的战略;③中国只需要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争取一个平等的份额;④中国为免受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的损害而发展必要的实力;⑤中国为维护全球和平、公正,为受不公正待遇者发言而发展必要的实力;⑥中国愿意率先实施以上立场,从我做起。

与人类共和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立场才是真正善意的立场,由此出发制定的发展战略,才是能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才是真正能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发展战略,才是打不败的发展战略,而且如汤因比、池田大作所说,可以对世界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不会去追求所谓武力崛起、“零和崛起”,

既不科学,也不明智,更有悖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3. 从根本上消除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和—大同天下观”是一个彻底善意的天下观,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前提下的中国利益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中国不需要威胁谁,只需要一份中正的公平足矣。

(五)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最后谈一谈总结、树立、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尽管目前为止,无论中外都已有汗牛充栋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但其实并没有人真正系统、客观、精准地总结、归纳和建构过中国国家的历史形象。中国历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学界没有自觉因而悬而未决的课题,也是对当下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极其重要的必须尽快解决的课题。特别是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往往以臆测来对中国进行判断,甚至以这种臆测为政策依据。这可以说是造成当下“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格局、氛围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从中国对自身的认识,从中国如何为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如何对外进行阐述、推介,还是从消解世界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误判,都非常有必要系统、客观、精准地总结、树立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本文可以算作是总结、树立、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的尝试,但只是一个视角,即对外关系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视角的观察与思考。这个视角可以初步得出的关于中国国家历史形象的要点可能是:

1. 中国文化从根上就是中和文化,对内实施中庸之道、仁政德治,达到持久统一,对外协和万邦,谋求四海咸宁,实施和平礼仪外交。

2. 以儒家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从未主动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个别少数民族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最终以进入中原,归化于和合告终。

3. 以儒家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即使有对外战争,也以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目的,没有大屠杀、种族灭绝,总体上没有占领、掠夺、奴役,所谓朝贡制主要是四海咸宁的仪式,基本都是倒贴的。

4. 中国实现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持久统一,这为面积相仿却分成几十个国家并争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为当今四分五裂的世界,提供了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与实践范例。

5. 结论:中国是一个中和非战,以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理想的国家。

中国国家历史形象当然远不止本文的一个视角。我们的初步构想,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1. 幅员辽阔,地形多样,雄奇壮丽且自足圆满的国家

中国幅员辽阔,历来是全球少数几个大国之一。中国地形特别丰富多样,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最长的河流之一的长江;山地、高原、盆地、平原、丘陵、河流、湖泊,大错大落,雄奇壮丽;西面及西南面是高山、高原,北面是草原、大漠、荒凉的寒带,东面南面濒临大海,整个国家具有全球罕见的地域独立性,因而造成了自足圆满的极为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类型体系。

2. 以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政治昌明领先世界千余年的国家

无论中外学界都承认,自隋唐至明代一千多年,中国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所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建立了一个指数模型,比较西方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据他搜集的证据,西方人工种植、驯养动物、大型建筑、原始文字、建圣坛均远远早于中国。西方领先了一千多年。自周、秦、汉与亚述、罗马帝国并驾齐驱。但自公元541年(左右)起,尤其隋唐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超越西方,至公元700年,中国社会发展比西方高三分之一,公元1100年,比西方高百分之四十。这种领先延伸到1700年以后的明代,被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取代。

中国的科技以应用层面见长。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阴阳合历带动的天文学,计算见长的数学,以技术制作见长的物理学,炼丹术切入的化学,整体施治的中医,养体健身的气功、武术。尤其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3. 实现多民族持久统一、仁政德治、倡导修齐治平、发明科举的国家

中国与欧洲面积差不多,但欧洲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互相争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却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在整体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分不开,包括仁政德治、内圣外王,在用人上举贤任能,发明科举选拔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国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治理链。其中家庭又连着宗族制度,它制约着基层政治与民间伦理道德的稳定。

4. 人民仁义礼智信、勤奋、坚韧、中庸、温厚的国家

在大多数时代里,中国人从民间到政界奉行仁义,讲究礼仪、信用,中国人聪明、精明、勤奋、耐劳,遇事忍耐、富有韧性,处事中庸、温厚平易,知足常乐,极少盛气凌人,非常好客,不能容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就智而言,据美国心理学协会测试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人平均 IQ 值最高,为 106 左右,而白种人为 100。

5. 中和非战,以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理想的国家(已述)

6. 创立方块字,形成独特语言,在持久统一的背景下,成为全球唯一古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家

中国创立方块字,延伸至东亚数国。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等,字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由方块字构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有持久生命力的语言体系。由于不间断统一等原因,中国成为唯一延续了古文明的国家。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文明),除中国古文明外的其它三大古文明连文字都早已废弃,至少是曾经中断过,今已面目全非。

7. 建构儒释道思想体系、崇尚天人合一、长于综合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国家

道家、儒家是中国本土思想,佛教从印度传来,但一传入就儒道化,三者构成中国思想史的主体。中国崇尚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关于自然与万物组成与诞生的概念,天是自然,也是天道,即自然大道,天人合一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其中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当下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生态平衡。一般认为,中国人擅长综合思维,权衡方方面面,善于总体把握。西方人擅长分析思维,善于科学性逻辑性,但容易顾此失彼。中国人文科学不同于西方的长于抽象的逻辑思辨,而常用具象思维,史学如《史记》是讲故事,哲学如庄子是用寓言说,戏曲唱词全是诗,小说也要“有诗为证”,绘画、书法、建筑、园林都讲意境,基本审美范畴都是从诗学批发的。家家门上贴的对联、二十四节气的谚语都是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法说话,林语堂甚至说“诗是中国人的宗教”。

8. 生活内容优渥、优雅,衣食住行休闲游冶特别考究的国家

中国的饮食远比全球其它国家更加丰富多样,而且讲究色香味俱佳,并有令人沉醉的酒文化相佐。中国服饰不仅审美独特,而且常常使用最高端的质料,如丝绸。唯美玲珑的建筑、雕花精致的家具加独具匠心的园林,典型的民居远超古代西方。从秦起“车同轨”,修起北至燕赵、南抵吴楚、东达齐鲁的广五十步的驰道,隋修自北京到杭州,连接黄河、长江及南方水系的大运河,小到乌篷,大到下西洋的百米巨舸,使中国在“行”上下的功夫也远超西方。休闲常常与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相联,游历的同时要有陶冶,连西方第一娱乐的足球也是起源于中国的蹴鞠。

9. 从绘画、书法到音乐、戏曲……,拥有无数令人沉醉的艺术瑰宝的国家

中国的绘画、书法、音乐、戏曲、舞蹈、雕塑、洞窟艺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芸芸众生,盛世如汉唐,衰世如元末、南唐,处处都有光芒万丈。绘画历来有工笔、写意两派,写意画完全开辟出了不同于且高出西方写实的另一种世界。中国书法是举世独一无二的把文字审美多元化的奇葩式艺术。音乐在春秋就有所谓“八音”,即石(磬)、金(钟、钲、铎、铙等)、丝(琴、瑟)、竹(箫、箫、簫等)、匏(笙、竽等)、土(埙)、革(鼓、搏、拊)、木(柷、敔)。

10. 拥有布满四季的充满乡情与亲情,给人生活的情趣与快乐的民俗的国家

中国的民俗不仅有敬老尊师、祭祖拜神、庆丰消灾、婚丧仪式、礼尚往来等功能,而且往往充满浓浓的乡情、亲情,能够增加生活的情趣与快乐。在节庆活动中,仅大节就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比较重要的还有龙抬头(二月二)、上巳节(三月三)、寒食节(清明前一天)、中元节(鬼节、七月十五)、寒衣节(十月初一)、下元节(十月十五)、冬至、腊八、小年,并有许多类似的节日的活动,如社日(春夏秋冬各一次)、庙会、大集。这些节庆常常有烟花爆竹、踩高跷、耍龙舞狮、扭秧歌等表演,热闹非凡,可以给老老少少带来快乐,释放生活的压抑,如社日,有所谓“家家扶得醉人归”。

当然,中国的国家历史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是正面的,历史上也有一些国体失正、政策失误,甚至奸谬当道;也有一些君主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甚至施行暴政;有的战争造成生产荒废、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在长期阶级社会中,底层百姓处于被剥削地位,有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还有许多陋习颇具争议,如太监制、女人缠足。前面十种都是从与西方比较的视角上归纳的,只是强调了中国与西方相比,具有的整体成就及优势特色。

责任编辑:侯德彤 尹婷婷

Peaceful Development as China's National Ide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Historical Image

Feng Guoro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both China's national ideal and national goal, as well as the core cont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view of "Tianxia". This is inherently determined by the intrinsic qualit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a solid historical basi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balanced harmony, which has permeated the unity and harmony na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The unit history centered around the Central Plains has consistently exhibited an overall diplomatic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peaceful rituals and non-aggression in foreign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highest ideal has always been to achie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with no proactive initiation of large-scale external wars. Even in instances of war, it was aimed at "establishing peace under heaven" with the objective of achieving tranquility rather than engaging in slaughter, occupation, plunder, enslavement, or even genocide. The so-called "Tributary System" primarily served to ensur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largely giving more than China received. China's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actice in "harmony among all nations"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s with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global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balanced harmony" can offer new wisdom for humanity to move towards a bright future of shared goodness.

Key words: peaceful development; balanced harmony in the Tianxia perspective; harmony among all nations; national ideal; national character; moderate world;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forging friendship with each other